

DER TOTE IN DER MING-VASE

中国  
侦探  
小说



# 明花瓶中的死者

[德] 雅各布·安德哈特 著

钱 鹿 译

出版社

I 516.45  
1



# 明花瓶中的死者

[德] 雅各布·安德哈特 著

钱 鹿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花瓶中的死者:中国侦探小说/(德)安德哈特著;钱鹿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

ISBN 7-5080-2932-1

I. 明… II. ①安… ②钱…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56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7印张 143千字 2插页

2003年2月北京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第一章

### 1

布茨·莱纳茨没去过中国，当然更没有在那里定居过。柏林腾珀尔霍夫区，一幢背街的房子，四层。

傍晚。

布茨和我对着窗户站着，看着灯光昏暗的内院。布茨抽着烟，时不时将烟灰弹入窗台上一个黄铜小碟中。我们的身后堆着搬家时用的纸箱。对面楼上，与我们同层的窗户内亮着的一盏灯，此前我似乎从未见它亮过。夜幕降临，那灯光如同模糊不清的脸上一只脓肿的眼睛。

“现在连鼯鼠家都要暴露在阳光底下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看见那个女人的情景吗？大约是在十月一个星期六上午。”我问布茨。

我们搬进来以后的几个月中，这扇窗就一直是关闭着的，百叶窗的卷帘向下垂着。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断定那里面一定住着人，因为百叶窗叶片之间的距离在发生着变化，百叶窗的底部护窗板处偶尔也会露出一条缝来。一个星期六上午，百叶窗的卷帘第一次被卷了起来，最先看见的是一只胖胖的、深棕色的长毛绒熊。一双女人的手慢慢地用丝带将它拴在了窗户栏杆上。当我再一次看过去



时，注意到了那是一个女人。她只穿着一件长睡衣，脸色黯淡，这让她的脸看上去就像是那件脏睡衣的延续。

“连鼯鼠也得搬走了，”布茨答道，“柏林不再是过去的柏林了。”

“一切都不再是过去的模样，”我说，“一切都在改变，以自己固有的方式改变。”

布茨的脸上掠过一丝讽刺的笑。他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但是他并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一向保持和我意见相左，而今天，在这最后的一个晚上当然更不能例外。

“改变，说得多好啊，”他打了个哈欠，“这些老房子可都是要拆掉改建成奢华公寓的，真是老房子没人要，老好人没人爱。可以想像我们住过的这所老房子的悲惨命运，拆得只剩残垣断壁，上面涂鸦着‘No 奥林匹克在柏林’等等。”

“所以你选择躲到汉堡去。”我咧嘴冷笑了一声。

布茨又开始找他的烟。

“汉堡只是个权宜之计。几害相权，取其轻，汉堡至少还没有那么过分奢华，这你是知道的。”

“中国不更是这样吗？”

“是啊，你说的没错。不过确切地说，中国只是一个幻想。”

沉默。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院里响起了敲门声。有人走去开门，路灯下的影子飘到了光秃秃的灌木上。

“思想都被冻僵了，”我最后说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之间只剩下这样无聊的争吵。苍白的冬



日，浅蓝的天空，极目远望，苍茫如海。没有滑冰的人，眼见之处尽是棱角分明如水晶的冰层。如果不知情，也许此刻就会相信这是一件永恒的艺术品。但是我们很清楚，眼前的只是雪，只是雪和冰。是冰冻住了而已。——你觉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在有人开始愿意相信这件艺术品，但又不愿意承认事实的时候。”布茨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这个人就是你。”

“你没什么要拿的了？”我问道。

“没有了，”他答道，“了结了。鼯鼠遇上了光，但幸运的是，它适应了光线并活了下来。而我是躲进黑暗之中，你让我在黑暗中得到安宁。如果运气好的话……”说完，他带着嘲讽又很酷的表情，冷冷地笑着。我无话可说，看起来他对这种结束方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在房门口，我们彼此点了点头。我们各有一套房子钥匙，又分别把钥匙再交给管理处。搬家的过程也是各自分头进行。这是已经说好的，为的是让在分手的过程轻松一些。但现在我终于明白，布茨本身更希望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们有过共同的过去，但却没有共同的将来。是啊，没有人会知道彼此的未来会是怎样。布茨将消失在黑暗之中，而我直到最后——从那时起直到永远——也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我本想再多看他一眼，以记住他的模样。然而这根本是徒劳的。布茨比我高一个头，他的背后是楼梯间刺眼的灯光，我能看见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椭圆形状。与此同时，我听见的是他下楼时又快又轻的脚步声。



脚步声，轻，快，如同一把极其锋利的刀在身上划过，它是那么的突然，以致一时都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

一间宽敞的酒店客房。

镜子。

镜中的一张脸。

前面是一张窄长的榉木桌子，桌面上罩着一块白色的塑料布。必要时可以在这张桌子旁吃饭或写点东西。桌子的左边是榉木的架子、嵌在架子上的玻璃柜和一个小吧台，旁边是许多的窗户。窗框由铝框制成，厚重的铝框使得房间内只能通过窗户的玻璃看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外界风景。风景一共被分割成了八个部分，也是八张照片，尽管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但看上去却是彼此毫无关联。房间另外一端是一个小柜子，仍然是榉木的，上面是一台电视机，也是酒店客房必不可少的装备。旁边一扇推拉门，镶着磨光的玻璃，是通往卧室的门。

房间就是这样。

房间镜子里照出的是我的脸。接下来的三年中，安可·雷文和我就将住在这个房间里。安可是在十个礼拜前接受这项工作的，她将出任坐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国际皇家酒店餐饮部经理。而我是跟着她来这儿的，由于某些不便说的原因，我还将一直跟着她。

镜子中的这张脸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不引人注意，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中长的棕色头发，灰绿色的眼睛。要想改变这两者非常容易。我从来都无法理解，为何自述体小说中主人公“我”的外表和个性就只能是惟一不



变的。这种写法太武断，是对个性的误解。自述体小说主人公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不引人注意的，他只有眼睛和耳朵，就如同以第三人称形式在讲故事的“他”一样。他的个性和语言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有的只是一个可以延伸的外壳，不论谁都能马上进入其中。同样我姓甚名谁也根本不重要。如果我刚说完我的名字托马斯·芬施，人们马上就又忘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恭维，这个名字既说不上好听也不能算难听，说到底，名字和它的主人一样是无实际意义的。

可无论如何，这只是我给别人留的第一印象。若仔细观察，我在为人们习惯说的“意义”而抗争的时候，还是和其他人有所区别的。“人们写东西时，都写在一条线的上方或下方，总是写在行与行的间隔之内，而且人们所写的都是自己想说的话。”我却总是写在横线以外，而且我只写，什么也不说。“意义，你懂吗?! 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有意义！拉一条线，然后画一个十字，不是‘左’就是‘右’。否则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拿起笔，对准并碰上了那条线。“不行，不行，你必须把那条线想像成非常细，以至于……”尽管如此，只要我一出现，一切的定义和规则就失效了，原本设想得很好的游戏也变得无法进行下去。特别这几年中，我对规则和所谓“意义”的杀伤能力已经操练得日益成熟，经常是只要我出现，就已经足够了。

对我而言，像今天这样阴沉沉的天气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在铺着瓷砖的阳台的一头，窗外的景象让人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幻觉还是事实？哪里是它的边界？我们到了





这里以来，太阳是白天里的月亮挂在北京的天空。平台后的两座高楼隐约矗立在雾气之中。右边的那座是深蓝色的，左边的浅粉色，就像是在夜晚的颜色。我看到的是什么？关于外界，我在脑海里记住的是什么？我应该感到幸福，因为这终于就是我所期盼的：无法辨清边界，对立面的互相重叠。但是我并不觉得幸福，因为这一切并不是因我而发生的。

报纸、杂志和书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没有幸福感，而是觉得不安，觉得连自己都变得陌生起来。熟悉的只剩下图和符号。我那张在镜子中的脸。突然我想在我开始与外界打交道之前，先知道并弄清楚这一切。

渐渐到了中午。雾气慢慢散去了。

下午的时候我离开了酒店。在旋转门前，我紧张了起来。又走了几步之后，夏天的热度让我极度兴奋起来。我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走了出去。尽管这样，我还是出去了。

外面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个白气球内部的世界。我身为一个观察者游走在其中。对我而言，气球的外层并不是障碍。因为往旁边看，又是一个新的气球，敞开了一个新的球的世界。我向前走着，似乎可以通过经过的气球的数目来测量已走过的路程。或者换一个比喻，那白色其实是我眼睛里的白色。是在我眼球的中央。只有通过它我才有感觉，只有它在不断地让我看见新的东西。此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束花，花放在一个用稻草编成的圆锥物上。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这些鲜艳的花朵，在周围一片白茫茫的非现实的世界中，它们显得是那么的不同。



“您好，先生！鲜花！你要鲜花吗？一百六十块！”

几平方米大小的牛皮纸上躺着人，他们穿着粗亚麻布料的衣服。之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竹管。这并不难，我马上知道，工人们就在脚手架的影子下睡觉。他们用其他工人的身体或腿当枕头，睡成了一排，就像是无数生命运河中的一道斜坡。

自行车上架一个油桶就成了一个可移动的炉子。再加上一个长条烤架，里面烧着木炭，上面烤着肉串，这就是一个厨房了。煤球整齐地堆放着，在墙的影子下，这些煤球像极了拳头大小的黑硬币。折叠式桌子上的塑料架上摆着已切成小块的葱、豆角、椰菜、辣椒和蘑菇。一切都像在办公用品里一样摆得井井有条，只是听不到电脑键盘的敲击声。一个驼背的中国女人，个头只有我的一半高，拄着手杖在我面前一跛一跛地走在人群之中。她的肩膀上挑着一个担子，担子里是上百串的糖葫芦。

接着我看见了树。我曾经读到过，过去十年中北京原本有超过八十万棵树。种树为的是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并防止沙尘暴。新建的外环路两侧种着绿化带。在北京，植物只要种入土中，就能深深地扎下根去。在我们酒店以及其他的酒店门前，在大使馆和单位楼前，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黄杨树和杉树，观赏花卉则被种在灰色的陶土花盆里。

我看到的是白杨树和金合欢。树后面是一个个像盒子般排列着的小厂、商店和餐馆。原本有好多的白泡泡此时全汇在了一起。一排的金属门提供了各种想像的空间。我紧靠在许多窗帘布料旁，这些窗帘布料就像布景一般垂到



了店铺的中间。一家三口是全部的角色，父亲和儿子在店铺的桌子旁吃饭，母亲则在缝纫机的操作台上用热水瓶里的热水沏茶。她的身后有一台电视正开着，这几乎成了布景的另一部分。在房间的一侧，一些布料的后面摆放着一张床。

我又向前走了三步，眼前换成了另一幅场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还在睡着午觉——睡在汽车配件架子上。

“你好！”

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只见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肚子，另一只手则平摊在我面前。他的食指和大拇指互相摩擦着作出要钱的手势。“什么都别给，”我想到安可的再三嘱咐，“因为只要一给钱，就会拥上来一堆讨钱的孩子。”可我还是给了，这时另外三个向我扑了过来。我赶紧逃进人群之中。二十米之后，我甩掉了他们。电视、舞台以及一切不真实的事情，这一切本与我无关。

几分钟之后，我又有了新的发现。那是一个又圆又白的洞，就像今天早上天上的太阳。林荫大道的终点是一个沿三环的汽车站。各个方向的立交桥在这里交汇，结成一个网络。如果北京的街道都像这样，估计我早就已经迷路了，尽管我会两句少得可怜的汉语。幸好北京主要的街道都是正向的。现在，在这个汽车站，我终于又回到了有序的世界了。我掏出一张折叠地图，起点在斜对面的312路公共汽车在距离酒店仅八十米的地方就有一站。

但是在起点站之字形的候车栏杆内已经排起了长队，这又是一次人生道路上的斗争。尽管如此，只要能让我不必走着回去，一切我就都认了。



随着轰隆的马达声，一辆无轨电车进站了。滑轨中已经松动的折叠车门打开了，感觉就像是一块铁板打在了另一块铁板上。刚才还拿着一面小红旗领着汽车在站内停下的女工作人员转眼就消失在人头簇动的候车长队之后。就如同水在沸腾并嘶嘶作响一般。龙的传人。只有那些真的知道这个词意思的人才能理解眼前出现的情况。壮年的男人们、年迈的老太太们、年轻的小姐们以及年长的老先生们都在向候车栏杆外挤着。一只脚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另一只脚则在电车的踏板上。他们跌跌撞撞地挤向中门和后门，为的是在那里能抢到一个座位。人群中，在我的身边，到处是被举到肩膀上、抱在怀里或被保护在爸爸和妈妈身体之间的晃晃悠悠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人口过剩！我跳出栏杆，和最后一批人一起挤进了后门并勉强站在了电车内第二个台阶上。每当车门开关，我都要向身后的人群挤一挤，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车门打着脸。我眼角的余光都被塑料袋和无数只胳膊充满。人口过剩。另外车上也没有给孩子准备的安全网和可以挂东西的钩子。

宿命论——这也许是说，即使在自己门前堵了也要表现出宽容。一辆车号为 1216 - 5931 的蓝色国营货车和一辆旅行社的白色大巴直直地撞上了并卡在了一起，大巴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而右边则停着我们的电车。堵车的原因是由前方造成的，具体位置不在视线范围之内。我昨天读到一篇有关风水的文章，正像里面所说，风水是中国占卜学的核心内容。我有些犹豫地想先通过 1216 这个数字来理解这门学问。在 12 分 16 秒的时间内，白色旅游大巴司机和货车司机都不愿做出丝毫让步。于是我们的电车向后



退半米，而之前一直被遮住的那辆黑色的大众桑塔纳轿车此时把水箱挤到了这两辆车之间。5931，59分31秒之后来了一名人民警察，他吹着警哨收拾了眼前混乱的局面。

十五分钟之后，车子又开了九十米。此时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隧道入口。九十分钟之后，我再次站在了酒店的旋转门边。当迎面吹来酒店内部的凉风时，我不禁干干地笑了几声；与此同时眼泪涌进了我的双眼。自从我离开酒店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礼貌友好地打招呼。和我打招呼的就是刚才在酒店门口的那个门童。我感觉自己刚才在外面好像一直就没有遇上过人，就好像潮水中感觉不到水滴一样。

晚上，在酒店的餐厅里，和我一样筋疲力尽的安可跟我讲起了她的美国总经理卡尔·希尔。在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上有着两条盘旋着的龙。毛笔画的龙头，很有气势，红色绵纸做的龙腹以及用印着花的、厚厚的宣纸做的龙腿和银色的龙爪，古色古香。另一条龙是一个矫健的骨架，身体是漆过的木条并用细细的线固定住，显得异常凶猛干练。我马上想到，今天跟我接触的可能是第二条龙。

安可告诉我：“希尔已经三年没迈出酒店的大门去城里转转了。他实在有太多事情要处理。而且他对这个城市根本没兴趣。坐出租车去机场，再坐出租车回酒店，这就足够了。他每半年出去旅行一次。冬天他回新泽西的家，夏天度三个星期的假。他和中国人的接触只限于工作上的来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他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此外再没别的想法了。”

临睡前，在这一天所有经历中为数不多的记忆褪色之



前，我想起了一则关于丽莎·雪尔的事。她也是美国人，但与卡尔·希尔的做法不同，只要她一有时间，她就去旅行。她想通过中国的各个省份来了解这个国家。“这些省才代表中国。”她这么认为。但是外国人在这些省份的惟一身份就只能是：投资方。不管情愿不情愿，只要外国人一进行这样的旅游，就必须是这种身份，如果无法忍受这个角色，就只好放弃某些地方旅行。

丽莎·雪尔一次去四川省出差，在返回北京的那天，她先在市政府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之后就被带到了一条狭长走道的入口处，两旁站有警卫把守。她正在犹豫是否能进去，警卫示意她继续往前走。走道的尽头，一名警卫替她拉开了丝绒幕布，刺眼的探照灯光让丽莎眯起眼睛。一位市政府领导上前握住了她的胳膊。他们站在一个舞台的边上，舞台中央是一个讲台。从左边和右边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声音：“先生们、夫人们，我们万分荣幸地欢迎外国投资商丽莎·雪尔光临燕都。现在请她给我们讲几句话。”

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整个大厅全坐满了，大概燕都市的所有名流全都在场。

丽莎冒着汗讲了几句之后，接下来就是当地土特产推荐活动。市长对他们的特产蜜饯大加赞扬。当副市长发言时，市长马上就停了下来，认真地听起来。副市长介绍的产品是转换插头。有欧洲的、澳大利亚的和中国的。丽莎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请求他们让她再考虑考虑。“下次吧，”她说道，“下次。”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表情。他们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们在一番精彩的表演之后可有不



小的收获。因为燕都市市长不仅欠着副市长一顿饭（因为副市长介绍市长的女儿进了喜庆的人大办公室），而且还欠着人大主任一次，原因是当时在建这一家合资公司时他出过力帮助了市长促成此事。用宴请外商的名义把欠的人情都还了，所有费用当然是公家出，借此机会还可以派辆好车，让大家在刚竣工的市高速公路上视察一番。

正是由于此时的丽莎已经在中国做过多次旅行，也正是由于她知道如何揣摩对方的心思，她才能在说“下次”时刚好符合了中国人的心意。这既表示了友好又不给对方以期待。其实在成都，人们几乎都不再期待能和外商合作项目，过去几年中的失败经验实在太多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下一次宴请——定在十一月如何？

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我醒了，脑子里禁不住慢慢活跃起来。大约十年前，在中国刚开始和国外做生意的时候，人们发现，八个星期对许多投资人来说是个极限。超过了八个星期，许多国外的商人就因再无法忍受和中国伙伴的矛盾冲突，而卸任回国。回国之后和中国的生意则再无下文。通过这次经历，这些投资人对他人的信任彻底被摧毁，自信也完全丧失；他们甚至再也不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人们在家里对比着各自的经历，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大多数的经历都是那么惊人的一致和简单。

一家汽车公司的经理住在北京友谊宾馆。他的房间在一楼。一天早上，当他慢慢醒过来时，他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街道。这天的天气阴沉沉的。他看着宾馆围墙外的中国人正骑着黑色的自行车去上班。一张张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从他的面前经过之后又消失在雾气之中。有把身板



挺直的年轻人，也有弓着腰的老人。这些脸大多扁平，也有几张稍微有些像欧洲人的脸型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感觉自己很安全。他最后看到的是一张抬得很高的脸。这个人精心将他的黑头发向后梳理，下巴刮的也很干净。

这就是自行车大军。

这位经理心想，一个小时之后，我也将开始一天的战斗。可之后他突然什么也不再想。他从床上跳了起来。

“天啊，我到底在哪里？”

他无助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答案，可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他从此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何处。

一则广告。大约九点半的时候，我在今天的中国新闻里发现了这则广告。“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位！你感兴趣吗？”

您感兴趣吗？

这份工作要求应聘人员的个人素质良好。

这是一份与年轻人在一起的工作。

我们的招聘条件是……

要求：会流利的英语或德语，可以周末加班，有教学经验，了解跨国文化差异。详情请垂询：薇罗妮卡·萨姆特曼，中德测量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中心……

“萨姆特曼，您是哪位？”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略显紧张的声音。

“我叫芬施，我给您打电话是因为看了您的广告。这个职位还空缺着吗？”





“是的，还空着。”

“这是份什么样的工作？”

“嗯，您想像中这是份什么样的工作？”

让我吃惊的是，此时这个声音听起来似乎很高兴，几乎和蔼了起来。“您还是看到了我们的广告。”

我心里有了一丝抵触的情绪。

“很遗憾，广告里好像没有要求应聘者还要具备丰富的想像力。”我说。

她尴尬地笑了。

“好吧。其实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不会卖关子来折磨你的。承安能让你想到什么？”

“您是指那个城市吗？”

“是啊。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厂，有我们五名德国雇员在那里。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是定期回国探亲的，但是这三年不行了。于是我们把他们的家属从德国带了过来。他们的孩子中，有四个今年夏天就中学毕业了。而承安没有大学，这就是说，现在这些孩子自己必须再搬一次家，搬往北京。”

“他们是德国孩子吗？”

“是的。一个女孩三个男孩，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六岁左右。他们想在这里成立一个集体宿舍。我们是要对他们的父母负责任的。”

我犹豫了。

“这是你们公司高层的想法吧？”

“什么？”

“嗯，这是道命令啊。”